



近代城市史研究中的城乡问题探微

任吉东

摘要:在近代城市史研究中,城乡问题一直处于薄弱环节。一方面,城市史研究应该具备城乡视野,实现城乡角色的自我定位和转化,采用“从下而上”的观察视角来解读分析城乡问题。另一方面,学者们对城乡关注角度的变化也体现了城市史研究的志趣转向,表明了城乡研究未来的发展潜力和方向,而城乡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需要给予充分重视和完善。

关键词:近代城市史;城乡角色;城乡差异;士绅

中图分类号:K928.5;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17)01-0031-05

毋庸讳言,虽然“英语世界关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正是从研究城乡关系开始的”^①,而大部分学者们也基本认同:“城市史这个概念是建立在如下观点之上的:城市有其独特之处。如果城市与社会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再把‘城市史’当作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进行讨论就没有意义。无论城市的特性包括什么——无论它是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既然明确是城市,其特征就应该使其与乡村区分开来。因此,任何综合性的城市史都应该包括对城乡关系的考察。”^②

但关于城乡问题的研究一直以来仅仅是作为城市的一个伴生参照物而出现的,即使是在近代城市史研究如火如荼的今天,作为独立分支的城乡问题一直处于不上不下的夹生状态,是其他分支研究的擦边球:“由于传统对于城、乡问题的研究,大多并不是直接针对城市或乡村而引发,而是在探讨相关问题时,如乡绅地主、地方赋役、商品流通与市场、基层管理、地方治安、地域社会和文化、‘共同体’研究等,才关涉较多。”^③有鉴于此,相对于近代城市史的其他分支来讲,城乡研究无疑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它既是连通城市与乡村两个专业学科的桥梁和纽带,又是两者都常常选择性忽略的边缘和过渡领域。

然而毋须赘言,城乡研究无论对如日中天的城市史还是渐入佳境的乡村史来讲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对前者,城市史必须重视城乡研究,重新解读城乡研究在城市史中的角色和地位,重新审视城乡研究的重点和趋向,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的深度和广度,才能对近代城市转型发展路径和特点有更为直观的认识和解读,也才能正确理解当下社会城乡关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与症结。

一、角色与方法:城市史研究中的城乡站位解读

作为人类文明产生以来的两种不同社会生存场域,城乡各自代表的既是两种相异的

① 卢汉超. 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23(1): 116.

② 周锡瑞. 华北城市的近代化——对近年来国外研究的思考. 孟宪科, 译. 城市史研究, 2002, 21: 13.

③ 冯贤亮. 明清时期中国的城乡关系——一种学术史理路的考察.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37(3): 113.

生存空间,更是诸多相依的社会关系,不仅仅包含有简单的地理区位指向,更涵盖有复杂的人文社会内容。虽然由于彼此的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以及人文形态的不同,城乡往往被视为对立存在而加以表征,但是两者又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的,正所谓“无乡不城、无城不乡”。

城市的起源和发展都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城市的众多起源论中,大多数学者比较认同的是城乡发展的自然顺序,即城市由乡村衍化而来,乡村是城市的源头,城市是乡村的方向,而在城市形成以后,城乡在经济文化上对彼此都发挥着效力不等的影响,古代是这样,现代亦然,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象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无论是乡村形成城市(乡村城市化),还是城市回归乡村(城市乡村化),两者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彼此对立统一、依存包容、密不可分、浑然一体。因此无论在城市史还是乡村史研究中,我们都应该力求从城乡的整体出发,将城乡个体与城乡整体统筹兼顾,而不应该只是偏执于一方而忽略另一方的存在,形成没有乡村的城市史和没有城市的乡村史。

而对于城市史研究来说,这个问题更为重要和举足轻重。无论是研究个案城市、区域城市乃至不同类型的城市群体,首先必须把城市置于与之相对应的城乡界限之中,从而有效精准地定位城乡角色在不同范围中、不同区间内的相互转化。因为无论城市规模如何,跨度几何,都会有在空间和时间上与之对应存在的腹地乡村作为支撑和呼应,就好比学者论述的那样,站在上海的位置,中国的其他城市皆为乡村内陆地位,而站在西方国际城市的角度,上海也不得不屈尊为乡村腹地角色,城乡之间角色互换与联系是我们研究城市史必须具备的思维和视野。

西方城市史学者在研究中就十分关注城乡的相互关系,重视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如芝加哥学派就认为,城市发展是与周围环境息息相关的,外部乡村环境的诸多因素决定着城市未来前景与发展特征;新城市史学派更是把城乡作为一个统一的有机过程的两端,着重论述城乡从量变到质变的进程。而在施坚雅之后,学者们对城乡关注也逐渐从小城乡升华到大城乡,即从城市一郊区县镇扩展到城市一乡村腹地,“过去对于中国社会城市和农村的较为流行的认识,不论认为二者间是自发的对立,还是相反认为二者彼此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都逐渐让位于对城市中心地及其区域腹地发展的相互联系程度的研究”^①。

同时,当我们深入观察和细入探讨近代中国城市的各种城市问题和不同社会层面时,也不应该只局限于站位于城市的角度,以城看城容易陷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窘境和困境,而应该移身换位于乡村层境,以“从下而上”的站位视角,通过乡村眼光来审视城市话语,从而把城市与乡村置于同一个平面上加以分析比较,得到更为立体多维、全面透彻的观感和体验。

而事实上,这种从下而上的乡村站位更能反映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内生驱动力和外部制约力,从而更到位地理解中国式乡村城市化的发展道路,诸如赵冈提出的“余粮率”那样,将城市内部(城市)发展规模的局限所在与城市外部(乡村)粮食生产相联系,对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关系提出了独到见解,也诠释了江南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市镇形成之路^②。另一位学者黄宗智对乡村的过密化解读也论证了城市与乡村文化差别的经济成因:“大城市的产生伴随着农村的人均低收入,都市的‘发展’伴随着农村的过密化,正是中国历史上上层社会文化和农民文化之间显著差别的导因。巨大而复杂的城市使都市的上层文化得到高水平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建筑在农村过密化的贫困之上的。”^③

可见,只有定位于城乡角色转化、站位于城乡整体视野,才能更精准地体察理解城市发展的区域特征和动力所在,体映出城乡之间的内部联系和互动影响,从而拓展城市史研究的外延界面和场域体位,激活城乡本身应有的层次性和辐射性。

①林达·约翰逊. 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 成一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

②赵冈. 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5.

③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北京:中华书局,1992:331-332.

二、经济与文化：城市史研究中的城乡差别探究

目前为止,关于城乡差别的问题一直是城市史研究关注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它既是城市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史研究的走向。

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普遍赞同中国城乡之间分化的结果是近代的产物,诚如卢汉超所言:“在二十世纪,乡村的衰败和城市的工业化并行,促进了城乡的分化,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城乡一体化渐渐被城乡断层所取代。”^①

对于这种城乡差异,学者们早期关注的是经济层面的诠释,“粗略地看,1949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可以看作由两部分组成一个很大的农业(或农村)部分,包括大约75%的人口,和一个很小的非农业(或城市)部分,以半现代的通商口岸城市为主要基地。中国农村出产占全国产出量65%的农产品,也利用手工业、小买卖和老式运输。有一个与城市的联系变化不定的农业腹地附属于城市部分,它主要分布在通向港口的河流沿岸和铁路沿线,它可以与中国农村的主体区别开来,因为它在较大程度上与城市部分的沿海和沿河城市贸易”^②。

在经济活动上,城市与乡村的界限泾渭分明,但又各司其职,各有功用。如果把前近代城市看作是一种传送带,“它联结与农村相接的各条道路,主要地在各地资源流动上起一种内外穿梭的作用”^③,那么近代城市则是一台挖掘机,“自耕农输给了城市里的大的土地投资者——有点像美国农业家庭面对着农业经营公司的金钱势力那样。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新的士绅商人混合阶层使用武力加强了城市对农村日益加重的剥削”^④。

晚期的注意力多集中在文化层面。学者们认为,“城市是所有近代事物的集中地,而乡村则被看做是传统地区并被当做落后的典型。造就近代社会的新科技——电力、汽车、柏油路、摩天大楼、摄影、电影、电话和电报——几乎无一例外地集中在城市。近代经济诸如工厂、银行和百货商店(惟一的例外是采矿业)也都是城市独有的现象。所有这些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技术上的变化,其结果是使城市逐渐产生出一种明显区别于周围乡村的新型近代文化。城乡之间的文化鸿沟在20世纪上半叶不断扩大”^⑤。

文化鸿沟的形成使得传统中国城乡那种无差别的连续统一体状态消失殆尽,基于城市意识之上的城市优越感成为社会的共识。虽然在中国,“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间清楚地分野很早就消失了,虽则世界上许多别的地方久久地保留着这个特点,直到近代才消失,而在他国文明里,这又产生了独特的城市傲态。在中国,这种傲态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在帝国时代开始时似乎就已消失了,他消失的这么早,使得城市优越感竟至分毫不留了”^⑥。然而在最晚至明清时期这种城市优越感已经萌芽再起,卷土重来,“明清以来随着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市民文化的繁荣,城市无论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有所发展,城市地位有所提高,市民渐有凌驾乡民之上的趋势。但直到通商口岸出现,城市优越感才普遍形成。其中上海这样的通商大埠则在促成城市优越感上面起了举足轻重作用”^⑦。这些与乡村,甚至是与它相毗邻的乡村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乡村相距不到十英里;水稻田和村庄,可以从市区的任何一座高楼大厦上瞧的清清楚楚。这是世界上最为轮廓鲜明、最富于戏剧性的边界之一。传统的中国绵亘不断,差不多伸展到外国租界的边缘为止。在乡村,人们看不到上海影响的任何迹象”^⑧。

在讨论近代城乡关系转变原因的问题上,在经济层面上,学者们多归因于城市近代化和经济发展的

① 卢汉超. 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段炼,吴敏,子羽,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

②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 杨品泉,张言,孙开远,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36.

③ 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98.

④ 费正清. 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 刘尊棋,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26.

⑤ 周锡瑞. 华北城市的近代化——对近年来国外研究的思考. 孟宪科,译. 城市史研究,2002,21:14.

⑥ 卢汉超. 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段炼,吴敏,子羽,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14.

⑦ 卢汉超. 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3(1):116.

⑧ 罗兹·墨菲. 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4.

推动。早期的论点最典型的当属“冲击—反应”模式^①,但费正清也在后期部分地纠正了自己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承认了中国的近代化主因是中国自身内在生命和动力的因素。罗威廉的研究则以与“原初工业化”含义大致相同的“现代早期”来解释这种转变,他认为,“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长途贸易的发展导致地方生产专业化以便供应远方市场的需求——低地国家和江南的手工纺织品是最著名的、但不是唯一的例子。由于这些新的、地方性的、面向外销的产品实际上是在乡村或郊区生产的,诸如运输协调、估价和最后加工等许多职能,都势必在主要城市进行。这不仅改变了城乡关系的性质,也改变了城市自身的内部结构。伴随着大规模的机械化工厂企业集中出现在城市郊区,城市外貌发生了重大的、引人注目的变化(在欧洲始于1780年前后,在中国始于1895年前后),它又进一步引发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②。

在文化层面上,学者们部分地归因于士绅群体的作用,认为在士绅阶层的缺位和异化是城乡文化分离的根源之一,士绅阶层中介地位的丧失导致城乡人文联系被迫割断,“老式的地主士大夫纷纷迁移到城市里去了,他们和他们的佃户间原有的相互依存以致个人间的互相往来关系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非个人的市场关系。村社共同体意识也没有了。此外,下层士绅(比一般百姓高一层)也被卷入金钱来往中,从而加强了地租负担和对农民的剥削”^③。谢和耐也承认:“伴随着使某些农村变空,在资本外流的同时,人才也离开了内地的辽阔农村……过去的社会精英有着强韧的地方关系并且与农村社会保持着某种接触,他们处于传统而多少还关心一些农民阶级的利益。但对于商业资产阶级和开放口岸的知识分子来说,情况却大不相同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范围以及深受西方影响的思想意识,都使他们越来越远离农民阶级了。”^④

这种中介桥梁的缺失使得城乡文化交流与互动功能陷于瘫痪和丧失,城市精英文化与乡村大众文化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开始出现,而之所以会在城市出现传统乡村文化的延留和固守,则“可以通过区分城市社会中的不同阶级来找到。受近代科技和外国影响最大的是城市精英阶层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乡村的多数人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我们看到城市贫民的社会习俗、生活条件及娱乐方式,就会注意到古老的乡村文化在城市中的存在。当城市精英在文化上变得与乡村日益疏远时,城市贫民反而在社会文化方面一直与乡村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⑤。

在城乡差别这个根本问题上的这种从经济层面到文化层面的探讨转向和角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城市史研究的研究趋向与转变,即学者们的研究志趣逐渐从关注经济为主题的总体宏观层面,逐渐过渡到偏于碎片化的城市社会文化微观层面,开始力图用一种新的文化视角来解读城乡问题,为我们呈现出城乡社会内部更加丰富多彩、更为立体全面的历史景观与大众百态。

三、问题与建议:城市史研究中的城乡发展审视

作为城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问题虽然已经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数量,而且日益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但总体而言,目前仍面临着一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重点突破和解决。

理论框架缺失。与城市史研究的窘境相同,城乡研究作为独立的学科远未成熟,甚至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定义还存在模糊和分歧,需要进一步加以厘析明。而在理论上也还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无法摆脱西方框架下的理论束缚,未能真正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城乡实际的带有权权威性的理论体系和框架。

①叶哲铭.在“西方中心”与“中国中心”之间——论《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费正清的史学研究模式.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80.

②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江溶,鲁西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

③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75.

④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耿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538.

⑤周锡瑞.华北城市的近代化——对近年来国外研究的思考.孟宪科,译.城市史研究,2002,21:18.

研究区位失衡。研究中仍然存在“东多西少”和抓大放小的失衡现象。相对发达的沿海和沿江地区研究成果较多,而内陆和边疆省份研究相对薄弱。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大中城市周边,而中国各地差异巨大的大多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研究还处于薄弱或空白状态,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区域城乡研究和整体宏观研究的全面展开。比较性研究极度缺乏,尤其需要开展不同区域城乡的比较研究,目前这方面的成果不容乐观。

交叉研究缺乏。在研究中运用历史方法的成果较多,而交叉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的成果尚不多见,特别是对新文化史、网络分析、大数据方法的利用和借鉴还十分欠缺。尤其缺少对通史的融会贯通和缺乏能够统领古代、近代和当代的城乡发展的比较和总括性研究。另外,对一些社会文化、社会群体研究不够,如民间信仰、行业发展和非主流群体等方面继承性和融合性的研究。

针对中国城乡研究领域存在的上述问题,今后研究的方向和进路建议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重视方法与理论的创新。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借鉴人类学、地理学与城市学的研究方法,加强对新文化史、网络分析的吸收和借鉴,总结各区域各时段城乡发展规律,通过有选择地借鉴西方成熟理论,加以吸收创新,构建整合具有中国城乡特色的理论框架。

重视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一方面要开展多层次、多角度不同地区的个案研究,尤其是中小城镇的城乡问题研究,这是当前研究的短板。另一方面要对区域城乡进行系统和分类研究,勾画出区域的整体发展特点和主线,进而形成长时段与短时段、点线面相辅相成、互为参考和借鉴的综合研究体系。

重视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在横向上,重视比较同一时段不同地域的城乡发展特点,尤其是东西部、沿海与内陆等地区的城乡发展模式。在纵向上,加强对同一区域在传统、近代以及当代不同时段的主题,特别是在城乡信仰观念、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研究,构画出带有跨时代、长时期的发展异同和特点规律。

An Exploration on the Micro of Urban-rural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Urban History

REN Jidong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In the study of modern urban history, urban-rural problems has been a weak link. On the one hand, the urban history research should have urban-rural vision, realizing the character's self-image and transformation and using "from the bottom up" point of view to interpret analysis of urban-rural problems. On the other hand, scholars concern for urban-rural point of view have changed. That reflected the inclination to urban history research, showing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urban-rural research and short board need to give full attention and perfect.

Key words: modern urban history; urban-rural role; gap between cities and rural area; landed scholars and gentry

●收稿日期:2016-11-15

●作者地址:任吉东,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 300191。Email:renjd76@163.com。

●基金项目:天津市 2013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TJZL13-0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AZS018)

●责任编辑:何坤翁